

# 抗日战争时期顾颉刚民众观念的演变\*

李政君

**提 要：**自新文化运动时期开始，顾颉刚就对民众问题有所关注，但当时他更侧重阐释民众文化的学术价值。20世纪30年代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他的关注点逐渐从民众文化转向民众本身，并倡导“唤醒民众”。“唤醒民众”具有唤起民众抗日救亡的目的，这是大的时代环境使然，但就其根本诉求而言，则是要在当时的中国进行一场“以全体国民为对象”的教育运动，以求民众现代观念、现代意识的觉醒。

**关键词：**顾颉刚 唤醒民众 抗日救亡 现代启蒙

顾颉刚的民众观念发端于新文化运动时期，20世纪30年代曾出现重要调整，1949年后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他对新政权的认知。可以说，对民众问题的关注，贯穿了顾颉刚的一生，是我们认识其学术思想的重要线索。对此，学界在研究顾颉刚史学思想时虽已有所涉及，但专门研究并不是很多。<sup>①</sup> 本文拟以抗日战争时期为主，略述顾颉刚民众观念的演变。

## 一 抗日战争前顾颉刚的民众观念

顾颉刚正式就民众问题表达看法，是在1920年前后开始的民俗探索中。1918年，顾颉刚因丧妻休学，为排遣心中苦闷，加入北京大学歌谣征集活动，开始搜集吴歌。学界一般将这场着眼于“文学改良”的歌谣征集活动，视为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发端。顾颉刚参与其中，本是作为“怡情适性”的消遣，没有强烈的目的性，所以当时他搜集吴歌，也多为胡适等人提倡“方言文学”助力。这一点，无论从整理吴歌主要作一些文字注解工作，还是后来结集为《吴歌甲集》出版时，胡适、沈兼士、俞平伯等撰写的序言，都可看出。<sup>②</sup> 对于歌谣的价值，顾颉刚此时也认同胡适的观点，即“方言的文学”可以为“国语的文学”供给“新材料”“新血脉”。<sup>③</sup> 如他编辑《吴歌甲集》，收录与沈兼士、魏建功等人关于“歌谣中标字的讨论”的书信，用意便是要打破学界“许多人要执住了死文字来驾驭活语言”的观念。<sup>④</sup> 可见，顾颉刚最初涉足民众文化领域，带有较大的偶然性，他对民众文化价值的认知，也主要集中在为文学改良提供“新血脉”方面。

顾颉刚在整理吴歌过程中，虽注意了歌谣形式和意义的“转变”现象，也就是学界常说的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中国抗日战争志》（项目编号：16KZD021）研究成果之一。

① 学界研究主要集中于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的民众文化探索与其“层累”说的学术关联，相关成果如王汎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一个思想史的分析》（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黄海烈：《顾颉刚“层累说”与20世纪中国古史学》（中华书局，2016年）、袁先欣：《顾颉刚的古史与民俗学研究关系再探讨》（《清华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等。对于顾颉刚民众观念本身及其演变的研究相对而言并不是很多，可参见刘俐娜：《顾颉刚学术研究中的民众情结》（《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王雪：《民众教育：抗战时期知识分子关注边疆问题的着眼点——以顾颉刚的西北民族考察活动为例》（《档案》2020年第2期）等。

② 《吴歌甲集》及胡适等人的序文，见顾颉刚：《顾颉刚民俗论文集》第1卷，中华书局，2011年，第3—114页。

③ 参见胡适：《答黄觉僧君》，《胡适文存一集》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3年影印本，第153页。

④ 参见顾颉刚：《吴歌甲集·附录》，《顾颉刚民俗论文集》第1卷，第163页。

“层累”说的重要思想来源，但当时他并未将这项工作继续下去。<sup>①</sup>后来，当顾颉刚在“整理国故”中逐渐走向疑古辨伪，有了明确的学术目标后，才深切体会到“转变”的学术价值，真正产生了发掘民众文化的自觉。如1922年他在致钱玄同所表示：要把“歌谣的转变”作为学术工具，来批判汉代以来形成的诗教传统，以洗刷出《诗》的真相。<sup>②</sup>他随后发表的《诗经的厄运与幸运》《从诗经中整理出歌谣的意见》《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等文，也确实秉持着这一宗旨。当时，他撰写的《孟姜女故事的转变》及续文，宗旨也是“用故事的眼光解释古史的构成”，并未离开“打倒假史实”“表彰真传说”的目的。<sup>③</sup>顾颉刚的《诗经》研究，对20世纪“诗经学”突破传统走向现代，具有重要推动作用<sup>④</sup>；其孟姜女故事研究，也被誉为民俗学的经典，“标志着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研究新范式的建立”<sup>⑤</sup>。这些成就背后，显示顾颉刚对民众文化优越性的肯定，但这种肯定主要是立足于对传统文化的改造，而不是对民众文化本身的建设，民众文化主要是为他改造传统文化，提供了一种不可多得的参照。

1925年，顾颉刚受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风俗调查会之托，与容庚、容肇祖、孙伏园等调查妙峰山香会，涉足民众信仰领域后，对民众文化才逐渐出现“眼光向下”的实质性转变。顾颉刚对民众信仰的兴趣，由研究古史引起<sup>⑥</sup>，但这次他对民众信仰价值的诠释，却不仅是着眼于改造传统文化。如《妙峰山的香会》中借对着“智识阶级”的批评说道：“如再不吸收多量的强壮的血液，我们民族的前途更不知要衰颓的成什么样子了！强壮的血液在哪里？这并不难找，强壮的民族的文化是一种，自己民族中的下级社会的文化保存着一点人类的新鲜气象的是一种。”<sup>⑦</sup>在此，顾颉刚把民众文化形容为挽救民族衰颓的“强壮血液”，其重要性较之改造传统文化显然有所提高。

1927年，顾颉刚任职广州中山大学后，进一步投身民众文化建设当中，提出“打破以圣贤为中心的历史，建设全民众的历史”，“研究旧文化，创造新文化”等口号。<sup>⑧</sup>有学者将之视为一场新史学运动，也有学者认为由此形成了一个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历史民俗学派”<sup>⑨</sup>。顾颉刚的旨趣首先是学术的，不过，他对这场“运动”的期望，似乎已经超出了单纯的学术层面，如他在提出“研究旧文化，创造新文化”口号后，曾说：

新文化运动并未成功……我们的使命，就在继续呼声……使得民众觉悟到自身的地位，发生享受文化的要求，把以前不自觉的创造的文化更经一番自觉的修改与进展，向着新生活

① 参见王煦华为《顾颉刚民俗论文集》所写前言，第5—6页。

② 参见顾颉刚：《致钱玄同：论诗经歌词转变书》（1922年2月19日），《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11卷，中华书局，2011年，第112页。

③ 参见顾颉刚：《顾颉刚启事》《〈孟姜女故事研究集〉第一册〈自序〉》，《顾颉刚民俗论文集》第2卷，第566、4页。

④ 参见夏传才：《20世纪诗经学》，学苑出版社，2005年，第110页。

⑤ 户晓辉：《论顾颉刚研究孟姜女故事的科学方法》，《民族艺术》2003年第4期。

⑥ 参见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1卷，第64页；《东岳庙游记》，《顾颉刚民俗论文集》第2卷，第481页。

⑦ 顾颉刚：《妙峰山的香会》，《顾颉刚民俗论文集》第2卷，第359页。

⑧ 参见顾颉刚：《〈民俗周刊〉发刊辞》，《顾颉刚民俗论文集》第2卷，第570页。

⑨ 分别见杨堃：《关于民俗学的几个问题》，《杨堃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1年，第218页；施爱东：《中国现代民俗学检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39页。

的目标而猛进。能够这样，将来新文化运动就由全民众自己起来运动，自然蔚成极大的势力，而有彻底成功的一天了。<sup>①</sup>

可见，顾颉刚对这场“运动”的期望，不仅是民俗学或新史学运动，而且是新文化运动的继续与扩大。

以上可见，从赞成“方言文学”可以为“国语文学”提供“新血脉”，到把民众文化视为挽救民族衰颓的“强壮血液”，认为民众的自觉才是新文化运动取得彻底成功的根本，顾颉刚都对民众文化寄予了较高期望。不过我们也应看到，这一时期，顾颉刚真正关注的其实是民众的文化而非民众本身。对此，有论著指出：“顾颉刚所倾力关注的并非老百姓，而是老百姓的文化——那是与关怀老百姓极不相同的另一回事。”<sup>②</sup>当然，顾颉刚的关注点并非从未转向“老百姓”，但这一转向主要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

## 二 抗日战争时期顾颉刚的民众观念

在顾颉刚的关注点从民众文化向民众本身的转变过程中，抗日战争起到了重要作用，不过，其最初的推动因素并不是抗日战争，而是“辛未访古”。

1931年，顾颉刚与洪业、容庚等组织旅行团，沿黄河流域“访古”，因为这年为旧历辛未，所以称“辛未访古”。顾颉刚参与“辛未访古”，本是为调节身心<sup>③</sup>，但沿途所见，却处处是国计民生的愁惨暗淡，如其自述，“鸦片、白面、梅毒，肆其凶焰”，“兵灾、匪祸，连结不解”，“国人十之七八犹过其原始生活”，“即无伐者知必鱼烂而自亡矣”<sup>④</sup>。这种景象，显然迥异于他之前所认为的民众文化是挽救民族衰颓的“强壮血液”，会对其既往的民众观念造成巨大冲击，如其事后自述：先前的民众观，是一个错觉，是中了旧诗和旧画的毒，是脱离实际的想象；从此以后，鸦片、白面、梅毒、大铜圆、农村破产，永远占据了我的心。<sup>⑤</sup>事实也是如此，辛未访古以后，类似“农村破产”“鱼烂而亡”“亡国灭种”等说法，在他的文字中屡有出现。

辛未访古对顾颉刚的重要影响，就是推动他从侧重阐释民众文化的学术价值，转而开始真正关注民众本身。如他后来所说：自己只望终老于研究室的志愿，二十余年未曾变过，其间“却做了社会运动，也接近了政治工作。为什么会这样？再也想不到是作了一次旅行的结果”，“从此以后，总觉在研究学问之外，应当做些救国救民的事，我要学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了”<sup>⑥</sup>。由此，顾颉刚便从先前倡导发掘民众文化，转而走向了直接“到民间去”“唤醒民众”的实践。例如，数月后，面对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他应《中学生》杂志征稿，撰写《贡献给今日的青年》，便提出：

你如果问我，应开出怎样的路，我将答说：“到民间去”……大家羡慕高车驷马的虚

① 顾颉刚：《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顾颉刚民俗论文集》第2卷，第575—576页。

② [美]施耐德著，梅寅生译：《顾颉刚与中国新史学——民族主义与取代中国传统方案的探索》，华世出版社，1984年，第162页。

③ 参见顾颉刚：《顾颉刚自传》，《宝树园文存》第6卷，中华书局，2011年，第358页。

④ 顾颉刚：《辛未访古日记》，《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5卷，第398页。

⑤ 参见顾颉刚：《农村卫生不可不严重注意——这是中华民族生死关头的大问题》，《宝树园文存》第6卷，第276页；《致胡适》（1934年7月16日），《顾颉刚书信集》第1卷，中华书局，2011年，第485页。

⑥ 顾颉刚：《顾颉刚自传》，《宝树园文存》第6卷，第357、359页。

荣，大家沉沦金迷纸醉的肉欲，大家榨取乡村的血汗来满足自己高贵的生活标准。结果，弄得到处农村破产……都会也成了病态的繁华……照这样下去，就使别国不来亡我，我也鱼烂而自亡；不但亡国，并且灭种……你应该走到乡间去，作根本救国之计……我们所要下死工夫研究的，就是怎样可以把自己的脊梁竖起来，真正唤醒民众，作有效的抵抗？<sup>①</sup>

九一八事变后，唤醒民众的民族观念以作有效抵抗的呼声，并不鲜见。但从引文中不难看出，顾颉刚所呼吁的“到民间去”“唤醒民众”，更多是延续着新文化运动的宗旨，而不是单纯的抵抗侵略。在他看来，新文化运动以来知识分子“到民间去”的主张没有问题，只是其方式不恰当，即知识分子与民众生活存在隔膜，不了解满足民众精神需求的方式方法，以致其作品形式和民众隔离的太远，民众看不懂，也不关心。因此，他认为要有效“唤醒民众”，必须取唱本、小说、戏剧等民众喜闻乐见的通俗形式，灌注以新文化的精神，也就是说他所说的“旧瓶装新酒”<sup>②</sup>。

随着日本侵华日益严重，顾颉刚才逐渐把“唤醒民众”的目的指向抗日救亡。1933年，当长城抗战再度激起国人的抗日情绪，他便提出要通过编刊通俗读物来宣传抗日，并于随后取“三户亡秦”之意，成立了专出宣传抗战通俗读物的“三户书社”（后改称“通俗读物编刊社”）<sup>③</sup>。三户书社的成立，标志着顾颉刚把“唤醒民众”和抗日救亡直接联系到了一起，如该社章程中规定的四项工作目标中，前两项就是“唤起民族意识”和“鼓励抵抗精神”<sup>④</sup>。

1934年，顾颉刚加入吴文藻、谢冰心等组织的“平绥线旅行团”，并在百灵庙与当时内蒙古自治运动的主事者德王及其僚属进行了三天会谈。<sup>⑤</sup>百灵庙会谈让顾颉刚意识到，“德王的主张高度自治，存心脱离中央，乃是受着日本人的威胁利诱所致”，开始担心“这个问题如不解决，则今日内地，明日即可成为边疆”，自觉“该得尽些鼓吹的责任，去唤醒国人”，“挽回国权，洗刷国耻”<sup>⑥</sup>。此后，顾颉刚进一步把“唤醒民众”指向了唤醒民众的民族意识和抵抗精神。

不过，抗日战争时期，顾颉刚“唤醒民众”的焦点，并非始终都在对外的抵抗侵略上，1937年9月至1938年9月的西北考察活动，又把他的关注点拉回到了内部问题上。西北考察原是应管理中庚庚款董事会聘请，考察西北教育状况，但按顾颉刚自己的说法，他在考察教育的同时，将眼光进一步拓展到“西北社会之基本问题”，一年之中，“舍康庄之陇东南及河西不游，而惟游于公路尚未通达之陇西”，跋涉于河、湟、洮、渭之间，考察了甘肃、青海两省19余市县。<sup>⑦</sup>此行也确实让他看到西北民众普遍的贫穷困苦和当地民族宗教问题的错综复杂，意识到中

① 顾颉刚：《贡献给今天的青年》，《宝树园文存》第3卷，第88—89页。

② 参见顾颉刚：《通俗读物的历史使命与创作方法》《旧瓶装新酒的创作方法论》，《宝树园文存》第3卷，第167—170、174—176页。

③ 三户书社成立当年，迫于日本人压力，更名为“通俗读物编刊社”。该社除出版唱本、连环画、画片等一般通俗读物外，还曾筹办《民众周报》《大众知识》等报刊。七七事变后，顾颉刚因被日本人通缉离平，通俗读物编刊社也辗转内迁。1940年，因生活书店被封等原因，通俗读物编刊社名存实亡。

④ 顾颉刚：《通俗读物编刊社章程》，《宝树园文存》第3卷，第94页。

⑤ 参见雷洁琼：《顾颉刚先生在燕大的活动》，王煦华编：《顾颉刚先生学行录》，中华书局，2006年，第87页。

⑥ 顾颉刚：《中国边疆问题及其对策》，《宝树园文存》第4卷，第172页。

⑦ 参见顾颉刚：《西北考察日记·序》，《宝树园文存》第4卷，第410页。

国边疆问题的严重性。<sup>①</sup>不过，这一次顾颉刚没有像百灵庙会谈后，把中国边疆问题的形成尽皆归咎于外患，而更多是转向了内忧。如其自述：

（百灵庙会谈后）我对边疆问题的注意点，偏重在外患方面，抗战发生的那一年，我到甘肃、青海一带走了一趟……方才觉得我们的边疆问题，不但是受外国人侵略的问题，而且是一个自己内部的问题。<sup>②</sup>

这里所说“内部问题”，主要是指边疆民众与中央政府，以及边疆各民族之间彼此隔膜，造成草木皆兵的“疑惧”心理，这种“疑惧”心理使得星火小事便会演为燎原之势的民族冲突。因此，要解决边疆问题，关键就在于改变民众的“疑惧”心理。<sup>③</sup>

在顾颉刚看来，这种“疑惧”心理的成因，主要在于民众教育缺失。如他屡次指出：西北各省，城郭丘墟，民生凋敝，寻其致祸之由，端在教育之不能普及，人民之闻见有限<sup>④</sup>；游汉回藏杂居之区，乃知积年之隔阂，正坐教育之不至<sup>⑤</sup>；边疆民众只知有宗教而不知有国家，加之帝国主义国家的分化宣传，更觉得危机四伏，这许多问题的症结，都在民众没有受到相当的教育。<sup>⑥</sup>这样，顾颉刚在很大程度上就把中国的边疆与民族问题，转换成了边疆民众的教育缺失问题，也就是他说的“自己内部的问题”。

因此，西北考察之后的一段时期内，“到边疆去”逐渐取代“到民间去”，成了顾颉刚呼吁的重点。<sup>⑦</sup>“到边疆去”的内容虽涉及诸多方面，但民众教育仍是其工作重点。而他所提倡的对边疆民众的教育方法，即利用广播、电影、戏剧等民众喜闻乐见的通俗形式“给予各种正确之知识”<sup>⑧</sup>，与此前“唤醒民众”的方法，并无根本不同，只不过其地域转移到了“边疆”。

### 三 顾颉刚“唤醒民众”的根本诉求

抗日战争时期，顾颉刚的关注点从民众文化逐渐转向民众本身，而其“唤醒民众”的工作，又存在灌输新文化观念、启蒙现代意识，和唤起民族意识、鼓励抵抗精神两种诉求。那么，二者在顾颉刚的观念中孰轻孰重？应该说，无论在上述编刊通俗读物活动中，还是在边疆民众教育活动中，顾颉刚都有唤起抗日救亡意识的动机，这是大的时代环境使然。但他在对上述活动的价值诠释中，却始终都没有离开向民众灌输新文化观念、启蒙现代意识的诉求，即便在抗战形势最为严峻的时期，也是如此。

首先，就编刊通俗读物而言。取“三户亡秦”之意而定名的三户书社成立当年，便因日本

① 参见顾颉刚：《中国历史与西北文化》《中国边疆问题及其对策》《考察西北后的感想》，《宝树园文存》第4卷，第204、172、82页。

② 顾颉刚：《中国边疆问题及其对策》，《宝树园文存》第4卷，第172—182页。

③ 参见顾颉刚：《顾颉刚自传》，《宝树园文存》第6卷，第368页。

④ 参见顾颉刚：《西北回蒙藏民教育提案》，《宝树园文存》第4卷，第316页。

⑤ 参见顾颉刚：《西北考察日记弁言》，《宝树园文存》第4卷，第404页。

⑥ 参见顾颉刚：《我们为什么要办民众读物》，《宝树园文存》第3卷，第328页。

⑦ 例如，他在重庆中央大学、中央组织部及边疆学校等处的演讲中，就多次呼吁：“青年们，到边疆去罢！到边疆去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创造一个新天地呢。”在《中国边疆学会边疆丛书总序》中，他也提出“要唤起一班内地的同志不辞辛苦到边疆去”。分别见顾颉刚：《宝树园文存》第4卷，第192、332页。

⑧ 顾颉刚：《西北回蒙藏民教育提案》，《宝树园文存》第4卷，第317页。

干涉而改称通俗读物编刊社，其宗旨也随之“由抗日的一义扩大为民众教育的全面”，“除了提倡民族意识外，凡是现代人拥有的常识，以及能激发人向上的意志的，全该编给民众看”<sup>①</sup>。通俗读物编刊社章程规定的四项目标中，也有两项是“激发向上的意志”和“灌输现代的常识”<sup>②</sup>。这种通过编刊通俗读物，向民众“灌输现代的常识”，进行现代观念启蒙的诉求，并不单是对日本干涉的变通。对此，我们从顾颉刚对通俗读物说下定义即可看出，即：

通俗读物应该是继续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主义精神，用通俗的口调……贯彻到下层民众的心中……来教育国民的杂志和书籍的总名称。<sup>③</sup>

在此，通过编刊通俗读物对民众进行现代启蒙的诉求，体现至为明显。事实上，即便在论述通俗读物对唤起民众抗日情绪的重要性时，顾颉刚依然提出，民众所处的“是大时代和新社会，他们负有许多重大的使命”，“如果现在我们给他们的只限于抗战时期的兴奋，恐怕到战事结束之后，他们就将以为大功告成了，从此天下太平了，仍可过着旧式的生活了。我们要使他们个个成为中华民国的健全公民，那么公民所应有的知识全部要用文学的技巧灌输到不甚受教育的民众心中，使得他们可以身体力行”<sup>④</sup>。可见，顾颉刚编刊通俗读物，最初虽由抗日引起，是要砥砺民众的抗战精神，但其更为根本或更为长远的诉求，乃是将“旧式”民众教育成现代“公民”，是对民众进行现代观念和现代意识启蒙。

其次，就边疆民众的教育活动而言。抗日战争时期，顾颉刚曾写下大量关于边疆问题的文字，且其中不乏离一般民众较远的理论探讨。比如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问题，就随着他和费孝通的争辩而表现出愈发浓厚的理论色彩，也显得愈发脱离了普通民众的接受范围，因而被时人批评为“陷于名词的讨论”<sup>⑤</sup>。不过，就事实而言，这并非顾颉刚的初衷。西北考察甫一结束，顾颉刚就在一次演讲中提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大致观点，对于这一观点，当时他心目中所设想的受众，就是普通的边疆民众。他是想让边疆民众了解“我们中华民族是不可分离的”，是“一个融化的大集团”，进而“产生出强大的团结力量来”<sup>⑥</sup>。只是到1939年《中华民族是一个》正式发表，并引起费孝通商榷后，这一论说才逐渐走向了理论的争鸣。但即便如此，顾颉刚在讨论中也曾特别提出：

我们现在所应积极提倡的乃是现代化，凡是现代人所应具备的知识和技能，现代人所应享受的物质生活，都该使得它普遍推行……我们说要把边民同化，决不是想消灭他们原有的文化，而只是为了他们的切身利益，希望他们增加知识和技能，享受现代的生活，成为一个中华民国的好公民，一个中华民族的健全分子……<sup>⑦</sup>

① 顾颉刚：《编印通俗读物的经过》，《宝树园文存》第3卷，第266页。

② 顾颉刚：《通俗读物编刊社章程》，《宝树园文存》第3卷，第94页。

③ 顾颉刚：《通俗读物的历史使命与创作方法》，《宝树园文存》第3卷，第168—169页。

④ 顾颉刚：《通俗读物的重要性》，《宝树园文存》第3卷，第282页。

⑤ 翦伯赞：《论中华民族与民族主义——读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后》，《中国史论集》（合编本），中华书局，2008年，第276—277页。

⑥ 顾颉刚：《考察西北后的感想》，《宝树园文存》第4卷，第87页。

⑦ 顾颉刚：《续论“民族”的意义和中国边疆问题》，《宝树园文存》第4卷，第132页。

可见，向民众灌输现代常识，把民众培养成现代公民，仍是顾颉刚从事边疆民众教育工作的重要诉求。

这里我们并不是要否认顾颉刚边疆民众教育中存在抗日救亡诉求，而是要说明抗日救亡和现代启蒙在顾颉刚的思想中所居层次的不同，即抗日救亡是阶段性目标，现代启蒙才是根本性诉求。对此，类似于1937年他在《边疆教育问题》中所说，边疆民众教育的目的，是辅助边疆民众发展固有的能力和智力，改良他们的社会，“当然我们也该从国防的立场上去看边疆教育，但这只是一方面的需要而已”。<sup>①</sup>

如果从阶段性目标来看，顾颉刚对“唤醒民众”的价值诠释，是随着时局的发展不断改变的。如抗战时期，他着眼于抗日救亡，到抗战胜利后，又将之视为“建国的利器”。<sup>②</sup>但在这些阶段性目标的背后，顾颉刚对“唤醒民众”的长期倡导，还有更为根本的诉求，即对民众进行现代意识、现代观念的启蒙，而这一诉求主要源于他对新文化运动的反思。

和很多学者一样，顾颉刚认为，新文化运动可分为具有提高性质的学术运动和具有普及性质的教育运动，前者已经取得了相对客观的成就，但后者却未能有效开展；而中国要想在积弱之余勉强跻身于强国之林，又必须将一般民众呼唤起来。<sup>③</sup>顾颉刚这种认识自20世纪20年代就已出现，直到40年代并无根本改变，而他每次对新文化运动反思与再倡导，又多伴随着对“唤醒民众”的强调。例如，1920年他就提出：我们的责任是要唤起民众的自觉心，让他们自己去负责；现在的新文化运动固然有力，但只限于学界一部分人。<sup>④</sup>1932年又提出：在这山穷水尽之际，勉作第二次新文化运动，开辟民众解放的路径。<sup>⑤</sup>1937年又说：此次战事终止之后，必有大规模的新文化运动发生。那时的运动，将由全体民众直接活动，我们有知识的人，此时应教育大众，与大众发生关系。<sup>⑥</sup>1947年更总结道：梁启超办《新民丛报》唤醒了全国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唤醒了全国的学生；现在我们在抗战之后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束缚，全国一心要建设一个新国家，一定要配合一个文化运动，这个文化运动一定要以全体国民为对象。<sup>⑦</sup>可见，顾颉刚对“唤醒民众”的价值诠释虽曾表现出多种面相，但他更为根本或一贯的诉求，是要在当时的中国进行一场“以全体国民为对象”的教育运动，以求民众现代观念、现代意识的觉醒。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中国历史研究院左玉河工作室）

本文责编：程方勇

① 顾颉刚：《边疆教育问题》，《宝树园文存》第4卷，第58页。

② 参见顾颉刚：《我们为什么要办民众读物》，《宝树园文存》第3卷，第330页。

③ 顾颉刚在《我对于五四运动的感想》《通俗读物的历史使命与创作方法》《通俗读物的重要性》《我们为什么要办民众读物》（《宝树园文存》第3卷，第314—321、167—170、280—283、325—331页）、《顾颉刚先生在欢迎大会讲演词》（《宝树园文存》第4卷，第247—248页）、《〈妙峰山进香专号〉引言》（《顾颉刚民俗论文集》第2卷，325—328页）等文中，均有相关论述。

④ 参见顾颉刚：《我们最要紧着手的两种运动——教育运动 学术运动》，《宝树园文存》第3卷，第11—12页。

⑤ 参见顾颉刚：《充实杂志发刊词》，《宝树园文存》第3卷，第93页。

⑥ 参见顾颉刚：《顾颉刚先生在欢迎大会讲演词》，《宝树园文存》第4卷，第247页。

⑦ 参见顾颉刚：《中国社会教育社年会致词》，《宝树园文存》第3卷，第334页。